

司法與社會工作實務

曾華源·白倩如

壹、司法社會工作的意義

犯罪社會學的標籤理論指出，犯罪者進入司法系統受到刑罰處分之後，將造成犯罪者被標籤化為「壞人」，此一身份極可能凌駕個人原本的身份，使有前科記錄的人在重返社會後，產生適應的困難，進而可能再次造成偏差或犯罪行為。法務部犯罪問題研究中心(1992)調查顯示更生人之更生意願高，且有超過半數決定出監之後要工作，但卻有許多更生人會因感到受差別待遇而困擾。

社會是否應該接納違規犯過者？「接納」是指社會願意讓違規犯過者有正常的社會生活；也就是說，犯錯的人被處罰之後，社會是還能夠接受他們，相信他們是改過自新。其實，對違規犯過者來說，除了要面對司法之處罰外，還必須面對社會所給予的「壞人」烙印(stigma)，此一烙印在其出獄或行為改過後，常常這些負面的印象跟著他一輩子，使他無法見容於社會，讓他隨時擔心受到社會排除，而且甚至有可能影響到其家人和下一代的社會參

與。然而，這是民主理性社會應該有的情況嗎？事實上，不論是受什麼原因的影響而發生違規犯過的行為，對於犯過者和他身邊的親人來說，都可說是一件不幸的事。

「Tie a Yellow Ribbon Round the Old Oak Tree」這首老歌是描寫一位因為違反票據而入獄三年的中年男性。他即將出獄時，寫信詢問妻子如果還願意接納他，就在在家門前的老橡樹上綁上一條黃絲帶。他出獄搭乘公車即將到家時，他緊張到甚至不敢睜開眼，於是懇請巴士司機幫他看結果……。最後他在全車乘客的歡呼聲中睜開雙眼，竟看到老橡樹上綁著上百條黃絲帶。這種溫馨感人的故事能普遍對每一位更生人？

但是另一方面，從犯罪受害者的角度來說，因犯罪行為而使個人身心受到創傷，除了要不斷面對恐懼、悲傷、羞辱、痛苦與憤恨等負面情緒，以及如何克服，

從創傷經驗中復原之外，還可能需要面對司法調查與審判過程中，可能會遭受到的第二次身心傷害。

社會工作會進入司法場域中，參與犯罪被害者的矯治工作時間較早，而協助犯罪被害人，提供保護和服務服務則是最近司法觀念的改變所致。現代民主社會關注人權議題，重視在司法審理、判決和處遇過程中，犯罪受害者與犯罪者的人權的保障，但是應被保障到何種程度？是值得深思探討的問題。因此，對於違規犯過行為如何給予適當之懲罰，才能產生預期效果外，還需要社會工作者參與處遇過程，關注雙方及其家庭成員之需要，而提出不同的協助。

一般人認為司法社會工作就是「矯治社會工作」，主要服務場域為監獄等矯治環境；甚至有人認為法院或地檢署所設置的觀護人就是矯治社會工作的一環。事實上，隨著民主社會的變遷與發展，對司法正義的期待越來越高。由於刑事政策及司法工作的重心與範圍已不再侷限於犯罪偵查、審判及矯正執行的範圍，而更關注於在司法執行的過程中，導入犯罪防治的理念，並以司法保護的手段予以推廣及落實。而司法保護工作，舉凡：犯罪預防、法治教育、被害預防、反毒、反賄選等宣導、更生保護、犯罪研究與分析，甚至被害保護……等，均屬此一範疇（施茂林，2007）。加之，當前司法矯治觀念受社會科學研究結果發現懲罰性監禁與矯治無效影響很大，而改極思改變懲罰性的矯治工作。

由於矯治性質的社會工作的工作哲

學，已從懲罰和應報工作變成問題解決取向（鄭瑞隆、邱顯良、李易蓁、李自強等譯，2007）。所以全面性犯罪防治模式包含預防犯罪於先、阻止犯罪於中、防止再犯於後，即所謂三級預防觀念（施茂林，2007）。第一級「預防犯罪」在於提供民眾的法治觀念和守法意願，使其不會、不想、不願犯罪；第二級「阻止犯罪」則是針對有犯罪之虞，或是以處理犯罪邊緣之特定對象，採取社區處遇模式的輔導或防治措施，使其不能、不敢犯罪；第三級「防止再犯」即進行犯罪研究與防治、知識推廣、預防被害教育、法律諮商服務、法律扶助、訴訟輔導、被害人保護、矯正與矯治、入監輔導、技能訓練、衛教治療、觀護（保護管束）、更生保護及社區處遇。因此，在司法場域中，社會工作除了面對犯罪被害人的矯治工作外，另一項則是對潛在犯罪被害人、犯罪被害人的保護或扶助工作。

社會工作者在三級犯罪防治模式中，均扮演重要角色。首先，從犯罪預防的角度來看，社會工作在教育體系與福利體系中的各項工作均可說與部分犯罪預防與宣導工作有關；其次，在矯治機構裡提供犯罪防治專業服務有教育、社會工作、觀護制度(probation system)；其中，觀護人(probation officer)即是執行個人被判保護管束(probation order)或入役服刑後假釋(parole)的觀察與輔導工作，此亦為社會工作專業服務體系的一環；在美國稱為法庭社會工作者(court social worker)，亦即在司法體系裡面的社會工作人員。在少年事件處理法中之規定，負責虞犯少年社區處遇

者稱為少年觀護人(juvenile probationer)，並分為調查官、保護官，而在成人部分就稱為成人觀護人(adult probationer)。另外在被害人保護工作中，提供被害人權益保護、更生保護和協調法律提供諮商服務、法律扶助、訴訟輔導等等。

貳、司法社會工作的發展進程

一、美國社會方面

在美國，對於犯罪者的矯治工作長久以來應該都是慈善與社會工作專業發展歷程中的一部份。從 1601 年的濟貧法開始，對於孤苦、貧窮與犯罪者提供慈善服務，許多收容機構或監獄都有宗教慈善者提供探訪服務。在英美國家，尚有許多提供出獄者食物與其他協助，睦鄰之家或會社也都是兼辦犯罪人的社會適應協助。然而，在社會工作逐漸專業化之後，卻與矯治社會工作的距離越來越遠，大多是偏向心理衛生機構提供協助，或是處理貧窮問題與兒童福利議題為多（鄭瑞隆等譯，2007）。直到 1945 年，賓州大學社會工作學院院長 Kenneth Pray 在擔任理事長的演說中，強調社會工作者必須在矯正機構裡提供服務。隨後，開始有人將社會工作教育課程中涵蓋矯正領域，強調必須讓社會工作者瞭解司法犯罪領域並產生興趣，隨後在福特基金會的贊助下，規劃社會工作教育要加入何種教育內容，以讓學生適合從事矯正領域的工作（鄭瑞隆等譯，2007）。不過，到了 1970 年代之間，並沒有更多社會工作者專注於矯正領域的專業發展。或許矯正

工作涉及不同領域的價值哲學，並且暴力或其他犯罪者的行為使社會工作者心理畏懼而難以突破，並積極在這領域開展其服務（鄭瑞隆等譯，2007）。1985 年，聯合國通過「犯罪被害人人權宣言」，提出建立犯罪被害人補償及援助制度、保障被害人的隱私與人身安全等概念。目前，美國矯治社會工作多投入在警政機關、矯治機關或觀護部門及少年法庭，工作重點在透過個別化處遇及社區復健方案改變犯罪加害人。

二、臺灣社會方面

台灣社會工作參與司法場域中提供服務，大致上可以分為犯罪防治和被害相關人和弱勢者權益維護兩方面。對於犯罪防治的專業處遇發展過程大致上與美國相似，早期大多是慈善訪視監獄，後來則比較偏向於對少年的觀護工作。在大學的社會工作教育課程中，也甚少有「觀護工作」課程，僅有學生實習安置會進入司法場域中。監獄矯治工作團隊甚少有社會工作職位，亦只有觀護人一職與社會工作相近。此後，隨著司法處遇觀念之轉變，社會工作才開始提供專業服務。

國內的少年觀護制度始於 1962 年公布之〈少年事件處理法〉，而於 1971 年 7 月 1 日開始在地方法院少年法庭設置觀護人。成年觀護制度之建立，則係於 1980 年 7 月 1 日審檢分隸時，前司法行政部改制為法務部，增設保護司掌理關於 18 歲以上成年犯保護管束執行之指導、監督事項，並於 1982 年在各地方法院檢察署設置

觀護人，專司成人之保護管束（馬鎮華，1985）。台北市政府於 1985 年依〈少年不良行為及虞犯預防辦法〉第十一條第一項規定，訂定〈臺北市少年輔導委員會設置要點〉，其中少年輔導委員所輔導之少年因案被諭知保護處分案例漸增，乃與觀護人合作，提供有關個案少年的輔導資料，以及觀護工作之銜接與轉介等相互合作。1998 年新修訂的〈少年事件處理法〉通過後，採「少年宜教不宜罰」之立法原則，寬嚴並濟、並以保護處分為原則，充滿著有別於成人刑事司法之「少年保護主義色彩」。觀護人職責功能更具有多元性，以提供具司法性質的社會福利工作為核心。

隨著人權觀念進步，在個人保護和權益維護方面，1993 年修訂〈兒童福利法〉，並至 2003 年與〈少年福利法〉合併為〈兒童及少年福利法〉，社會工作者協助為監護收養的訪視調查報告，並且規定對家庭變故或其他因素導致偏差行為少年要提供轉向(diversion)安置服務。1995 年訂頒〈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中，亦明訂要有縣市社會工作者在案件偵查、審判中，於訊問兒童或少年時，主管機關應指派社會工作者陪同在場，並得陳述意見。隨著政府委託民間機構辦理收養交查案件的訪視調查報告，並由社會工作專業機構，主動舉辦各式的活動，以增進司法與社工的互動與瞭解（賴月蜜，2005）。1997 年〈性侵害犯罪防治法〉通過，並於 2005 年修正。該法主旨在為防治性侵害犯罪及保護被害人權益，並規定內政部應設性侵害防治委員會。其中，第十五條規定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應指派社工人員得於偵查或審判中，陪同被害人在場，並得陳述意見，被害人為兒童或少年時亦同。1998 年 6 月通過〈家庭暴力防治法〉，各縣市政府應設置家庭暴力防治中心，並結合警政、教育、衛生、社政、戶政、司法等相關單位，緊急救援、緊急安置、協助診療、驗傷及取得證據之外，對被害人提供心理輔導、職業輔導、住宅輔導、與法律扶助，以及加害人心理治療與追蹤輔導之轉介等等。同年 10 月通過〈犯罪被害人保護法〉，該法之目的為「為保護因犯罪行為被害而死亡之遺屬或重傷者，以保障人民權益，促進社會安全。」其立法精神強調犯罪被害人此一族群亦如同勞工、殘障、幼兒及老人等皆屬於社會中弱勢的團體，當個人因犯罪被害的結果而需要公共的協助時，國家自應提供適當的援助。該法名稱雖為〈被害人保護法〉，但內容上實屬被害補償制度（盧映潔，2000）。

除此之外，現代婦女基金會自 2002 年開始承辦士林法院及台北市政府共同設置的「家庭暴力事件聯合服務處」。自此，社會工作開始正式參與司法體系，突破傳統的專業本位主義，以科際整合為概念運作模式，提供被害人更完善的保障措施，真正落實家庭暴力防治法「建立專業網絡、保障家庭暴力被害人」的立法精神（姚淑文，2006）。再者，法庭法官更注意到家庭與婚姻等家庭事務糾紛處理是無法單靠法律就能妥善處理，各地區法院法庭裁決前，常請社工提供調處和意見。由上述國內的發展歷程可知，在法規的逐步訂定

和民間團體集體的努力下，已經為國內建立「司法社會工作」的雛形。

參、司法相關場域中社會工作服務對象

一、犯罪者矯治與更生保護

(一) 監獄內的矯治與出獄前的社會適應準備

從犯罪矯正之立場來看，犯罪人是因為社會適應欠佳，經常處於心理衝突的狀態下，而在行為上呈現出異常、病態的人（林茂榮、楊士隆，2002）。因此亟待社會提供積極的輔導、矯正與治療，以便改變其偏差行為，增進其回歸社會之後能夠有良好的社會適應，而避免再犯。所以有效的矯治計畫應包含監獄內犯罪觀念與行為矯治、出獄更生準備和再出發等三個部分。其中，監獄內犯罪觀念與行為矯治在幫助受刑人適應監獄生活，特別是初犯，特別設計處遇計畫以滿足想要改正行為及可能改正行為之人犯的需求。除可以利用網路設置監獄聯絡中心，協助人犯與其遠地家屬保持聯繫外，評估受刑人矯治成功的可能性和調整安全需要及紀律要求，以幫助人犯改過向善（鄭瑞隆等譯，2007）。其次，更生則是指人犯要有立定志向、改過向上之決心，承諾自己出獄後過著更好的生活，展現更新其生活的願望及意志；至於再出發，則是取得社區居民的支援與認同，透過關懷網路，使人犯有機會重新獲得新生。

嚴格的矯治流程下必須是幫助受刑人找回其自我價值、自我意義和社會道德，矯治流程的制度化要能讓受刑人在心理、社會、情緒以及生理上獲得充分滿足並順利復歸社會。不過，以受刑人本身來說，回歸家庭的不利因素，包括：單親、工作不穩定、低學歷、再犯率高、低收入或不穩定、家庭暴力、以及子女的問題（學業、行為、情緒）、不健康的環境（暴力、物質濫用、犯罪紀錄）等風險因素。因此，針對有子女的受刑人，應該改善受刑人之教育與就職機會、鼓勵獨立生活，亟待矯正機構在服刑期間加強教化，提供職業訓練，協助生涯規劃（鄭峰銘，2006）。

除此之外，由於毒品戕害健康、嚴重危及社會治安，法務部依據〈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二十八條規定特別建立毒品防制會報規劃反毒專責機關，分別在全國北、中、南、東各成立一所獨立的戒治所（Drug Rehabilitation Centre），收容被裁定施以強制戒治之第一、二級毒品施用。戒治所是觀察勒戒收容人在勒戒期間，經評估有繼續施用傾向，檢察官向法院聲請裁定強制戒治，經法官裁定後，將勒戒收容人移送戒治所強制戒治之處所。民國 94 年特指示戒毒工作應結合醫療、社工、觀護等各項資源，從事吸毒者之毒品戒治工作。其中，台中戒治所全國唯一之少年戒治所，收容全國少年毒品犯實施戒治。

(二) 對更生保護人的協助

受刑人出獄要進入更生並非是容易的過程。由於受歧視和雇主刻板印象所影

響，以及缺乏對更生人的基本保障法規，而不論犯罪者有沒有接受職業訓練和就業前的準備，或社會經濟發展狀況良好與否，許多雇主就不會給更生人有公平就業機會。企業考量更生人再次犯罪所做出的傷害會影響公司的正常運作，為避免風險大多不願意雇用（廖滿足，2005）。目前國內的更生保護會有辦理就業訓練、轉介就業服務中心安置就業、協助開辦更生事業，與推介至協力廠商就業之外，更生保護會還建構就業服務網絡、建立輔導就業資料檔案、推動開辦事業創造以及提供就業資訊。此外，在更生人就業後，提供追蹤輔導六個月，並且得結合就業輔導機構之個案管理機制，提供更生人職場諮詢及生活輔導。

Bernard（1995；引自嚴健彰，2003）提出個體的保護因子能否產生復原作用，需視個體生活環境中是否有下列三種因子存在：(1)關懷的環境：至少有一位成人瞭解關心其未來的幸福；(2)積極的期望：清楚且明確度高的期望，並能提供有目的性之支持；(3)參與的機會：有機會對社會作有意義的投入。由此可知，更生人若要能順利回歸適應社會，除去個人要有明確就業意願和抱負之外，家庭成員之間相互支持，成人觀護或更生保護系統也需要有效運作，而社會也應該提供機會。周素嫻（2005）研究指出，依據更生保護會統計，更生人不得從事的行業分別規範在 82 個法條中。法務部犯罪問題研究中心（1999）研究假釋出獄者，面臨的社會適應問題以經濟困難與找不到工作為多，最大的期望

除了要有安定工作外，是希望能跟家人團聚。不過，有五分之二者認為就業機會受到影響，顯示出獄者就業障礙不少。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徐全裕（1998）研究工作不穩定是再次犯罪的高危險群。張智雄、柯雨瑞（2005）指出，家庭依附關係與戒毒者戒治處遇效果有相關性存在。

從上述的研究結果可以得知，更生人的更生過程中有許多的障礙和需求存在。除了外在環境的社會性障礙之外，個人的自我覺知、家庭互動關係等因素，其實是有相互密切關係存在。〈更生保護法〉第十一條規範，「實施更生保護得依情況，分別採用直接保護、間接保護與暫時保護等三種」。其中，直接保護包括：以教導、感化或技藝訓練之方式行之，對衰病老弱者，送救濟或醫療機構安置或治療。間接保護則是以輔導就業、就學或其他方式行之。至於暫時保護以遣送回籍或其他處所，或予以小額貸款或其他適當方式行之。曾學經（2004）的研究顯示，更生保護會總人數與法務部同年度出獄人數兩相比較後，發現更生保護會僅對約九分之一的更生人提供服務。

（三）對更生保護人家庭的協助

司法社會工作另一個重要的議題是協助更生保護人家庭成員處理社會適應問題。其實，更生人受到刑事懲罰之後，更生保護人及其家庭在社會適應上，還會繼續受到各種不同程度之挑戰。法務部犯罪問題研究中心（1999）研究假釋出獄者，面臨的社會適應問題以經濟困難與找不到工

作為多，最大的期望除了要有安定工作外，是希望能跟家人團聚。然而，個人犯罪之後，除犯罪者入監服刑之外，其家庭和子女生活照顧會受到很大的衝擊。除了家人和子女將是一種嚴重的心理創傷之外，另外未入監獄的成人要負起照顧子女的責任，還需要在鄰里街坊、學校和工作場所等社區生活中承擔污名和排斥（王瑞婉，2003）。由於國內外研究（Rex, 1996；Roberts, 1997；鄭瑞隆等譯，2007）均顯示，更生人在家庭和就業適應良好與否，與其再犯罪之可能性有高度相關。因此，對於更生人及其家庭在社會適應上的協助就顯得有很大的必要性。針對有子女的受刑人，應該改善受刑人之教育與就職機會、鼓勵獨立生活，亟待矯正機構在服刑期間加強教化，提供職業訓練，協助生涯規劃（鄭峰銘，2006）。因此，當受刑人入獄服刑時，必須評估受刑人家庭是否需要提供危機介入、評估家庭相關福利需求，以幫助更生人家庭增權，以協助家庭系統運作良好（曾華源，2007）。

二、對犯罪被害人和弱勢者之保護服務

在傳統法律制度下，因缺乏系統化、制度化的設計，致使犯罪被害人的保護措施顯得不足，而在司法審理過程中得不到應有的尊重與周全的照顧，衍生層出不窮的問題和需要。一般說來，犯罪被害者的需求包括提供免費的法律扶助，協助向被告申請賠償，提供醫療協助，協調讓犯罪被害人去醫院做生理或社會心理復健……

等等相關醫療救助，以及利用傳播媒體作宣導犯罪被害意識觀念以免助長犯罪。此外，建立與運用社會支持與資源系統、心理與價值的重建、全面性的照護，以及提供陪同偵訊和重要資訊以利法院審理……等，亦是犯罪被害人和弱勢者需要的保護權益與照顧措施。社會工作者針對犯罪被害人和弱勢者介入法院審理與處遇的工作，主要歸納有下列幾項：

（一）對一般犯罪被害人的保護服務

在台灣的社會福利系統中，社會工作所提供的保護類型專業服務已經開始受到重視。保護類型服務方案的設計更是跨越了社會福利、家庭服務、警察系統、司法體系、醫療院所……等等各種不同的專業領域。1999 年法務部成立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對因為遭受犯罪行為被害而死亡者之遺屬或受重傷者提供保護服務工作，並於 2003 修正〈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捐助及組織章程〉，將該會所屬各辦事處改為分會，並訂定〈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廣結志工參與犯罪被害人保護工作計畫〉。其主要保護服務工作包括：(1)安置收容、(2)醫療服務、(3)法律協助、(4)申請補償、(5)社會救助、(6)調查協助、(7)安全保護、(8)心理輔導、(9)生活重建、(10)未成年人補償金信託管理、(11)緊急資助、(12)向加害人起訴請求損害賠償，出具保證書、(13)訪視慰問。

（二）對家庭暴力被害人的保護服務

家庭已經不完全屬於私人不可介入之

領域。因為家庭暴力犯罪的危險程度日益嚴重，而傳統的救助、救濟等福利概念已不足以滿足需求，故必須以「科際整合協調、網絡相互連結」為概念，建構出完善的防治網絡，以提供家庭可能會受傷害與實際受害民眾更有效能的幫助。事實上，要針對家庭中的弱勢者做好家庭暴力防治的工作，已經不是單一體系所能獨立承載，並且希望被害人在求助的過程中，能夠在最短時間內獲得立即、完整而且是專業的扶助，而無保護安置之場所外，也不需要穿梭在各種不同的部門之間，延誤了處遇暴力、保障生命安全的時機。因此，依照家庭暴力防治法規定成立之家庭暴力防治中心，即是採取團隊組織分工合作方式提供各種相關且必要之服務給家暴受害人。由於家庭暴力被害人的保護處遇過程中對法律諮詢服務需求高，並且在科際整合和被服務者權益優先的概念影響下，首先現代婦女基金會在地方法院運作成立「家庭暴力事件聯合服務處」（姚淑文，2006），其目的在協助被害人完成司法程序的同時，結合各方資源，提供各類福利服務，以穩定被害人及其家庭的生活，讓整個家庭更有能力從創傷中恢復並重新出發。所提供之服務輸送就具備了「便利、完善而個別化」的高品質服務特色。

（三）對性侵害被害人保護服務

在性侵害案件最多的苗栗地檢署，現代婦女基金會首創犯罪被害人保護處，讓性侵害被害人、受暴婦女能在司法案件的審理過程中，得到更全面完善的照顧。犯

罪被害人保護處提供的服務有：陪同受害人出庭、協助被害人向司法人員了解案件進度，應案主要求隔離應訊、應訊完畢後先行離開等人身安全規劃。另外，若被害人對於司法人員對待感到不舒服時，社工也會成為案主及司法人員之間的溝通橋樑。犯罪被害人服務處也會視個案需求與各相關單位聯繫，包括：社會福利單位、醫療院所、司法單位……等等，以整合各種外在資源協助遭受性侵害之被害人。

（四）對被害人和弱勢者的權益保護服務

上述司法社會工作在國內之實務工作內容，以及所依據之法條包括針對犯罪被害人之保護與協助，就監護權及收養認可案件，社會工作者提出訪視調查報告（依據原兒童福利法、非訟事件法、兒童及少年福利法）；再者，就兒少性交易、性侵害、兒少保護、家庭暴力等案件或一般案件之被害人，或智能障礙無法完全陳述之被告或犯罪嫌犯人，不僅規定要陪同偵訊，亦需要陪同其出庭，並得在場陳述意見（依據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性侵害犯罪防治法、家庭暴力防治法、兒童及少年福利法、刑事訴訟法）；另外，家庭暴力受害者，可向法院聲請保護令以獲取保護和協助（依據家庭暴力防治法）；就保護令事件，提供意見予法院（依據家庭暴力防治法）；最後，就兒少保護案件：(1)得向法院聲請繼續安置；(2)安置期間，執行監護事件，作報告供法院備查；(3)就親權濫用嚴重之父母，得向法院聲請停止親權；(4)就兒少財產受侵害之虞，得請求法院指定

監護人或監護方法；(5)對兒少犯罪者，得向法院提起告訴(依據兒童及少年福利法)(賴月蜜，2006)。

從法律規範的沿革趨勢來看，在法院的訴訟程序上，社會工作專業服務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除了一開始被動的接受法院指示，為監護收養的訪視調查報告之外，更期待社會工作者能透過實地的訪視，藉由其會談技巧與專業觀察能力，以及對家庭及兒童的認識與專業知識，提出建議供法院為審理之參考。繼而，針對特殊案件，如：性侵害、家暴之被害人，在法庭上之協助陳述及保護相關權益。這是借重社會工作者與個案之間的信任與支持關係，由社會工作者陪同出庭，並且也尊重社會工作者對案件的看法，給予其在場陳述的權利。目前，相關法規中規定，社會工作者更可以積極地站在案主的立場，為案主的權益，主動向法院提出聲請，如：繼續安置、停止親權、指定財產監護，以及保護令的聲請……等等。總之，從目前法律的制定過程與內涵可以發現，國內越來越重視社會工作的專業服務，而在法院的訴訟程序中，納入社會工作專業協力，以共同維護當事人的公平與正義。

四、觀護工作

(一)對虞犯少年觀護服務

少年偏差行為發生的主要因素是受到家庭和學校社會化過程，以及同輩團體因素影響(蕭富聰，2000；蔡德輝、楊士隆，2003)。因此，若就少年缺乏獨立自我負責

學習機會的角度來看，他們也是環境影響的受害者。杜靜怡(2003)回顧台灣近五十年來少年犯罪發現，家庭因素占第一位，其次則是社會因素，顯示理解少年偏差行為是必須重視環境中的危險因子，而非僅考慮個人因素。

由於少年正值生理開始發育成長期，加上社會性互動機會和獨立性增加許多，因此多數少年均會從發生輕微偏差行為開始，諸如：逃家或學校課業不佳後，再經歷學校的社會性歧視時，將會使少年逃學、逃家、校內外結交不良朋友的機會大增。在此情況下，少年常會因為受同輩誘惑，或成群結黨遊蕩、或結交異性朋友而開始有過早的性關係、或偷竊或少年接觸、販賣違禁品，而少女則從事援交或進入不良場所工作，以便籌措生活費用或享受之所需。此時，少年的社會生活方式偏離社會期待，而且內在價值觀也會開始轉變，不僅缺乏社會抱負，也缺乏生活規劃與管理。若能在此時期加以介入處理，不僅容易導正少年未來發展，而且社會成本較低，這也是社會福利服務蘊含社會控制功能之所在。

為了保護少年兒童避免其淪於罪犯，當前先進國家在刑事政策上大多採用慈善父權(paternalism)的理念，不再以成人刑事司法的觀點對犯罪少年採取懲罰性的處遇，而是考量其特性與社會環境問題之間有密切之關係，採取保護性的福利服務(曾華源，2007)。

我國的少年事件處理法修正案於民國86年通過，顯示過去是以司法刑事系統為

主的少年事件處遇，已轉成為少年保護為主，司法福利系統受到相當程度的倚重，希望能透過社會工作專業在觀護工作上的功能能好好發揮，以強化少年的保護工作（李茂生，2001；施慧玲，1998）此一法規在審理程序和保護處遇上，皆以「以保護代替監禁，以教育代替處罰」的理念為原則，觀護人的主要工作確實維護少年最佳利益的角色，包括：權益維護或代言者(advocator)、調查者、輔導者、觸媒者、資源開發者、個案管理者。少年觀護人必須要能確實執行各項法規，落實以保護少年之權益、維護少年最佳利益因此，在少年事件審理和處遇過程中，少年觀護人除扮演協助司法刑事公正審判之外，還要以少年需求與權益維護為主。故少年觀護人之主要工作相當多；諸如：在少年尚未接受法官審理之前，應即通知少年調查官進行必要之調查，少年法院為決定宜否為保護處分或應為何種保護處分，認有必要時，得裁定將少年交付少年調查官為六個月以內期間之觀察。在開庭時，少年調查官並需出庭陳述對少年處遇之意見，以供法官裁量之參考，並參與協商審理，對於情節輕微案件，如少年法院認為以不付審理為適當者，得裁定為不付審理並為轉介處分。

由於上述工作的執行均是未進入司法審理程序，故定名為轉介處分。轉介處分可分為：轉介輔導、諭嚴加管教及告誡等處分；轉介處分依法應由少年調查官來負責執行。依據少年事件處理法第四十二條第一項規定，對少年之觀護有三項保護處

分：(1)訓誡，並得予以假日生活輔導、(2)交付保護管束並得命為勞動服務、(3)交付安置於適當之福利或教養機構輔導、(4)令入感化教育處所施以感化教育。而這些保護處分工作應是要能產生對少年之教育作用，以使其能改正偏差行為，而有更積極之發展。

(二)對成人的觀護服務

觀護制度是法院對於經過慎重選擇的刑事被告，所採用的社會調查與輔導監督的一種處遇方法。觀護工作（制度）它不僅受刑事政策思潮的影響，同時也受到現代社區性犯罪矯治的影響（黃維憲，1996）。在觀護制度的建立上，乃是先有緩刑、假釋及保護管束的法律規定，而後才有觀護制度的建立（徐錦鋒，1997；馬鎮華，1985）。這些刑事被告於觀護處分期間，雖然允許在正常的自由社會中生活與活動，但其行為與活動應遵守法院所諭知的條件及接受觀護人的輔導監督。

地方法院檢察署觀護人執行成人的保護管束工作對象有四：(1)依刑法第 92 條規定有關「感化教育處分」（刑法第 86 條）、「監護處分」（刑法第 87 條）、「禁戒處分」（刑法第 88、89 條）及「強制工作處分」（刑法第 90 條）之保安處分，按其情形得以保護管束（感化教育、監護、禁戒、強制工作、強制治療）代之；(2)依刑法第 74 條與第 93 條第 1 項規定「受緩刑之宣告者，在緩刑期內得付保護管束」；(3)刑法第 77 條與第 93 條第 2 項規定「假釋出獄者，在假釋中付保護管束」；(4)依毒

品危害防制條例之規定，須付保護管束者。

成人觀護人依據成人觀護制度，需進行定期的輔導工作訪視與約談受保護管束人，掌握與觀察受保護管束人的動態、工作狀況、家庭生活、交友情形以及健康情況。其中，輔導就業是重要工作，包括：代為爭取工作機會、轉介就業服務站登記，或推介參加職業訓練；此外，亦包含協助辦理小額創業貸款。並依據其個別需要，提供輔導就學、就醫和就養，使生活和學習得到妥善照顧（黃富源、曹光文，1996）。

肆、司法場域中，社會工作實務所面臨的挑戰

從前述對司法社會工作之整理與討論可以得知，在司法系統中，社會工作者是屬於從屬性的角色，使得社會工作專業服務被視之為是在次級領域中(secondary fields)運作的(胡慧嫻等譯，1997)。因此，當前國內社會工作在與司法場域中形成跨專業團隊合作時，將面臨以下的挑戰課題，亟待社會工作加以反思。

一、充實法學素養，以奠基司法社會工作專業發展之可能

若要能在司法系統採取跨專業團隊合作以提供專業服務，首先社會工作者必須要有足夠的法學素養。司法社會工作者作為司法體系專業團隊中的一員，倘若缺乏基礎法學概念，以及對服務對象所涉及法條、法理精神、司法程序……等之認識，

不但可能使團隊合作上產生困難，更可能犧牲服務對象之權益而不察。雖然近年來國內社會工作教育課程中，已逐漸重視社會工作者之法律素養，但普遍來說，有關行政法、民刑法和民刑訴訟法等等法律方面基本知識，在專業教育和繼續教育之中仍嫌不足。因此，加強社會工作學校與在職之法學教育，乃是司法社會工作發展的首要之務。

二、反思專業哲學，以明辨工作角色與價值倫理之兩難

事實上，雖然社會工作與司法系統同樣都是為服務對象爭取權益的專業工作，但是在專業的基礎哲學卻有不同。在司法社會工作領域中，社會工作者的角色會面對許多的衝突，例如：在發揮功能上，究竟是站在法院立場或應站在被服務者的立場提供服務，經常會使司法社會工作者面臨困難衝突或陷入兩難之中。尤其是社會工作是以協助弱勢者、保障弱勢者的權益為優先。因此，在次級領域中，社會工作者往往就需要更政治性的處理，但過度政治性，又恐將面臨工作團隊中的信任問題。特別是當觸法事件涉及違法之刑事責任等問題時，將使少年觀護工作、更生保護和矯治工作在司法福利面向中，面臨社會工作的倫理兩難議題。此外，在司法審判過程中究竟誰是案主？而作為觀護人，一方面要監督案主有無違規犯過，但另一方面又要協助案主，要如何才能取得其信任？此外，在個人的改變過程中，是否可以相信其生態系統中過去存在的關係系統

能一刀兩斷或仍然是藕斷絲連？更生人面對過去生態系統中的不良關係網絡是要觀護人協助切割？或讓案主自行切割？接受矯治時，若其子女或家人需要協助，目前的更生系統又應提供到何種程度的家屬協助服務？尤其是社會工作者面對家庭暴力的施暴者或性侵害等犯罪者時，除了要有高度自身安全和危機意識之外，更需加強對犯罪者之個人價值反思。

三、人權維護與權益倡導之落實與挑戰

「壞人」是否需要幫助，給予教育與發展機會？還是應該要予以矯正？社會工作在司法場域中，經常需面對許多爭議性的人權問題。其中，目前很熱門討論的議題即是「是否應該有死刑」、「死刑是否屬於社會正義的議題範疇？」、「執行死刑是否就是落實社會正義？」對於犯罪被害者之家屬來說，是否「報復」才能解心頭之恨或之痛？但是若從社會角度來說，誰有權力去殺死另一個人？尤其是在審判過程中，倘若犯罪者深深的確實悔悟、痛改前非，又應該由誰來「殺死」這個人？因此，從司法社會工作者的角度來說，需同時考量加害者與受害者的個人及其家庭系統時，在價值上與倫理上均是無法逃避此一議題，且必須思考個人之價值立場。此外，倘若司法社會工作要能落實人權維護，社會工作又有多少專業能力與行動力量可以以維護、倡導與代言？而案主又是否真正授權給社工？最後，是否會過於同情受暴者，而產生先入為主之偏見，不查事件發

生其中之因果關係或過早下定結論，反而限制嫌疑者基本權益，使其受到侵害。上述的種種議題均考驗未來司法社會工作之專業發展，以及專業服務品質和社會認可。

四、司法體系應充實服務網絡專業人力與服務範疇

以受刑人本身來說，回歸家庭的不利因素，包括：單親、工作不穩定、低學歷、再犯率高、低收入或不穩定、家庭暴力、以及子女的問題（學業、行為、情緒）、不健康的環境（暴力、物質濫用、犯罪紀錄）等風險因素。然而，根據更生保護法第十一條規範，實施更生保護得依情況，分別採用直接保護、間接保護與暫時保護等三種。其中，直接保護包括：以教導、感化或技藝訓練之方式行之，對衰病老弱者，送救濟或醫療機構安置或治療。間接保護以輔導就業、就學或其他方式行之。暫時保護以資送回籍或其他處所，或予以小額貸款或其他適當方式行之。顯然受刑人家庭之服務並不被包括在內。除此之外，更生保護與犯罪被害人保護工作均屬於檢察體系主管兼職擔任負責人，主要保護服務和其他具有專業性工作均招募志願服務者擔任。所能投入之時間和專業服務明顯是受到很大限制。期待司法體系能認知觀念與行動改變上一致。

伍、結語

社會工作專業使命在協助弱勢者的權益得到保障。司法是維護人民權益的制度

和場域。當社會朝民主法治發展，則個人權益愈受重視，並且透過法規制度來確保權益。目前各種司法理念已較過去更為開明。因此，在司法場域中，除了協助違法犯罪者重新適應社會之外，社會工作參與審理過程，提供各種專業性服務以確保應有權益得以維護，是實踐使命的重要途徑，這也是司法領域人員肯定社會工作專業能回應社會需要而接受提供服務，相當值得把握。不過，在司法場域中，社會工作專業服務不是主要的主宰者，這只是屬

於次級領域(secondary field)的服務。所以對於社會工作者執行服務所需，以及維護案主權益上，必須擁有基本法學素養、相關法規之規定和處理之程序法規之知識。因此，除了養成教育課程方案必須加入相關內容外，未來在職繼續教育與訓練課程更需要加入此一方面之課程，以強化社會工作者的專業性和提供勝任能力。

(本文作者：曾華源現為東海大學社會工作系教授；白倩如現為暨南國際大學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系博士生)

參考文獻

- 王珮玲(2007)。社工司法倡導的影響與相關因素探討—以家庭暴力及性侵害案件為例。「法律與家庭國際研討會」，台北：實踐大學。
- 李茂生(2001)。我國少年事件處理法的檢討與展望--以刑事司法與福利行政兩系統的交錯為論點。*月旦法學*，7，30-50。
- 杜靜怡(2003)。*半世紀來臺灣青少年犯罪之研究*。南投：暨南國際大學經濟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周憐嫻(2005)。更生人就業權、雇主僱用權與社會安全的平衡。*中央警察大學犯罪防治學報*，6，55-91。
- 林茂榮、楊士隆(2002)。*監獄學：犯罪矯正原理與實務*。台北：五南圖書。
- 法務部犯罪問題研究中心(1999)。*出獄人就業調查報告*。台北：法務部。
- 姚淑文(2006)。司法社工制度建立與願景。「全國首創—刑事司法被害人保護工作：苗栗地檢署被害人保護服務處」觀摩研討會。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台灣苗栗分會、財團法人現代婦女教育基金會聯合主辦。
- 施茂林(2007)。我國現行司法保護作為與未來展望。*刑事政策與犯罪研究論文集（十）*，1-42。
- 施慧玲(1998)。從福利觀點論我國少年事件處理法之修正。*月旦法學*，40，60-69。
- 胡慧嫻等譯(1997)。社會福利政策與社會工作實務。台北：楊智。
- 徐全裕(1998)。假釋出獄人行為表徵與再犯預測。*觀護*，28，2-9。
- 徐錦鋒(1997)。少年觀護制度的現況檢討及其展望。楊士隆、林健陽主編。*犯罪矯治一問*

- 題與對策，355-375。台北：五南。
- 馬傳鎮(2001)。台灣少年犯罪相關因素及預防對策之探討。中央警察大學學報，38，155-182。
- 馬鎮華(1985)。我國觀護制度的過去現在與未來。觀護簡訊，95，2-7。
- 張智雄、柯雨瑞(2005)。毒品強制戒治處遇成效與再犯影響之研究。中央警察大學犯罪防治學報，6，247-276。
- 曾華源(2007)。少年觀護工作的社會福利屬性與困境。犯罪與刑事司法研究，8，133-156。
- 曾華源(2007)。更生保護個案輔導之探討--自願與非自願個案的就業與家庭適應輔導。社區發展季刊，119，298-312。
- 黃富源、曹光文(1996)。成年觀護新趨勢。台北：心理。
- 黃維憲(1996)。談觀護工作應有的內涵與功能，觀護制度之回顧與展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1-10。台北：中華民國觀護協會。
- 蔡德輝、楊士隆(2003)。少年犯罪理論與實務(4th)。台北：五南。
- 鄭峰銘(2006)。更生人家庭復原力之研究。嘉義：國立嘉義大學家庭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
- 鄭瑞隆、邱顯良、李易蓁、李自強等譯(2007)，Roberts, A. R.原著。矯正社會工作。台北：心理。
- 盧映潔(2000)。淺論我國犯罪被害人保護法。逢甲人文社會學報，1，357-374。
- 蕭富聰(2000)。初犯經驗、父母失功能、非行朋友對再犯少年的影響之分析研究。彰化：彰化師範大學輔導與諮商研究所碩士論文。
- 賴月蜜(2005)。澳洲、香港、日本之家事商談相關制度比較研究—兼論我國家事商制度之現況與發展。南投：暨南國際大學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學系博士論文。
- 賴月蜜(2006)。社會工作在法院體系內發展之探討與省思，台灣社會工作實務與社會工作教育之對話與省思國際研討會。台北：實踐大學。
- 廖滿足(2005)。更生事業僱用更生人就業之管理現況研究。嘉義：國立中正大學勞工所碩士論文。
- 嚴健彰(2003)。出獄人復歸社會更生歷程之研究—從復原力的觀點探討之。嘉義：國立中正大學犯罪防治研究所碩士論文。
- 蘇妍如(2004)。社工員執行監護權訪視之現況與決策。南投：國立暨南國際大學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學系碩士論文。
- 蘇恆舜(1997)。保護管束少年再犯影響因素之研究。中央警察大學犯罪防治學系碩士論文。
- Betancourt, B., Dolmage, K., Johnson, C., Leach, T., Menchaca, J., Montero, D., & Wood, T.

(2007). Social workers' roles in the criminal justice system: Adapting to the USA's changing attitudes towards the death penalty, 1953-2001. *International Social Work*, 49(5), 615-627.

Roberts R. Albert. (1997). *Social Work in Juvenile and Criminal Justice Settings (2nd ed)*. New Jersey: New Brunswick.